

戒片兒童文學

浙江師院中文系編

• 儿童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

我 与 儿 童 文 学

目 录

张天翼	我的小传	(1)
严文井	自 传	(4)
叶君健	我与儿童文学	(6)
赵景深	我与儿童文学	(14)
袁 静	自 传	(19)
胡 奇	我与儿童文学	(22)
贺 宜	我和课外读物	(26)
金 近	我的小传	(31)
郭 风	自 传	(34)
刘 御	我与儿童文学	(38)
韩作黎	我的小传	(51)
管 桦	我的小传	(54)
刘 真	小 传	(56)
刘厚明	自 传	(60)
郑文光	我与儿童文学	(63)
何公超	小 传	(76)
严大椿	我和儿童文学	(79)
黄衣青	我的小传	(81)
李楚城	我与儿童文学	(84)
任大霖	我的自传	(86)
任大星	我的文学活动小传	(94)
黎汝清	自 传	(97)

乔 羽	自 传	(101)
徐光耀	自 传	(103)
肖甘牛	小 传	(107)
杨 啸	我的自传	(111)
赵 沛	小 传	(116)
雁 翼	我的自传	(118)
鲁 兵	我的自传	(124)
圣 野	我的自传	(127)
叶永烈	自 传	(133)
肖建亨	小 传	(139)
童恩正	我的经历	(143)
朱志尧	我的自述	(154)
熊塞声	我的自传	(157)
果向真	我的自传	(160)
葛翠林	我的自传	(171)
揭祥麟	我的自传	(174)
张继楼	自 传	(178)
刘饶民	自 传	(180)
郇朝祝	我的自述	(182)
杨大群	我与儿童文学	(187)
梁 泊	小 传	(190)
胡景芳	自 传	(196)
孙幼忱	自 传	(199)
鲁 克	小 传	(202)
陈子君	我要夺回失去的时间	(206)
	后 记	(212)

我的 小 传

张 天 翼

1906年9月16日生于南京。家庭（原是湖南湘乡人）靠父亲当教员和职员维持生活。为了谋生，一家人流转于南京、上海，后来住在杭州。在杭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学名张元定，号一之。

1924年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绘画，后因学费太贵，又对学校的课程不满，即辍学回杭。1925年秋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大学，至1927年5月又离开北京回到杭州、南京、上海一带。

1928年写了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1929年1卷10号），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并渐渐以写作为职业。当时还不能靠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负担家庭生活，曾当过家庭教师，替人抄写帐簿，做过报纸编辑、职员、图书管理员等。

1931年“九·一八”以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工作，如大众文艺委员会，《北斗》和《十字街头》等刊物的编委会。1932年3、4月间到南京组织过一个“左联”分盟。从这之后，除1935年曾一度在大学里教过课外，专门从事写作，并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往返于上海、杭州、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到湖南，在长沙参加一些

抗日救亡工作和文艺活动。由1938年到1942年又在大学里教过书，作过报纸编辑，同时仍写作。

1942年下半年开始，患严重肺结核，停止了一切工作和写作活动。先后在四川重庆、成都、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养病，直到1950年。

从1928年到1942年生病前后的十五年间，写过几十篇短篇小说，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勿约》、《追》、《春风》、《畸人集》、《同乡们》、《速写三篇》等。中篇小说有《清明时节》。长篇小说有《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泾浜奇侠》、《在城市里》等。

从1932年开始，就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除短篇小说《失题的故事》、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外，长篇童话有《大林和小林》（又名《好兄弟》、《两林的故事》）以及《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因病未写完）等。1948年至1949年在香港还写过一些寓言。

除创作外，还写过数十篇谈创作问题、创作经验和评论作品的文章以及其他杂文，如《论阿Q》、《谈人物描写》、《贾宝玉的出家》等。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由香港回到北京。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参加过第一、二、三次中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先后任过中央文学讲习所副主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组组长以及《人民文学》主编等。除从事文艺工作外，主要写作活动仍是搞儿童文学，并多次在文艺界的会议上发言和写文章，呼吁多为孩子们创作文艺作品。

从1951年以来，先后写作、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短篇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儿童剧：《蓉生在家里》；童话剧：《大灰狼》等。其中《罗文应的故事》曾于1954年获得全国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上述的1951年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品结集出版，书名《给孩子们》。此外，还写过一些谈文学创作问题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评论文章如《〈西游记〉札记》、《略论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杂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写作权利，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过去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小说等才重新出版、再版。

1975年以来，由于患脑血栓症，暂时不能创作，但在文艺界召开的有关会议上，都作了书面发言，为孩子们呼吁；希望多为孩子们创作文艺作品，希望注意培养青年儿童文学创作者。并将自己过去谈创作问题、创作经验的发言、笔记整理成文章发表。从197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儿童文学问题的书面发言和文章有：《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人民日报》1978年6月1日）、《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少年文艺》1978年第7期）、《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文艺报》1978年第6期）、《一点希望》（《儿童文学》1979年第8期）、《从人物出发及其他——1961年8月10日在北京市儿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等。

在1979年11月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人民文学》编委。

自 传

严 文 井

我原名严文锦。1915年10月15日生。湖北武昌人。1934年夏毕业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35年春到北京图书馆当小职员，不久，以笔名“严文井”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1937年春在上海良友公司出版散文集《山寺暮》。1938年5月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从“抗大”提前毕业，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从事写作，年底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1940年在重庆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个人主义思想。1941年在桂林美学出版社出版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描写了旧社会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好未来的热望。在延安的八年当中，还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未能收集出版。1945年冬到东北，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1947年出版反映土地改革的报告文学《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1949年写了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歌颂了劳动和集体主义。1951年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从1953年春起，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亚非作家会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出版杂文集《关于鞭子的感想》（作家出版社）。1956年访问印度回国后，写作出版了游记

《印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后若干年中还访问了苏联、越南、波兰、埃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日本、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任第五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临时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在所有作品中，以童话和寓言的影响为较大。1950年发表的童话《蚯蚓和蜜蜂的故事》，曾获1953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办的儿童文学奖。1954年出版的童话《三只骄傲的小猫》，曾译成英文和日文。1957年出版的中篇童话《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曾译成英文、俄文、捷克文、日文、朝鲜文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话合集《小溪流的歌》，将这一类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收集进去了。

（1978年8月）

我与儿童文学

叶君健

现在超过了六十岁的人，如果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一个很尖锐的感觉恐怕就是：那时没有书读——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当时我有幸在乡下进一个私塾，学得认识几个字，但很快烦恼就来了：找不到适当的书看。老师并不是不教书——事实上教得很严，他每天教的书第二天都得背诵出来。但那不是我所要读的书，也读不懂。最初读的一本书是《三字经》，虽然能够背诵，实际上一句也不懂。接着读的一本书是《百家姓》。它每句有四个字，读起来琅琅上口，还押韵，但就是味如嚼蜡，半点意思也没有。再接下去就是“四书”、“五经”。对我来说，它们当时简直就象“天书”，莫明其妙。所谓儿童的“精神生活”或“文化生活”，根本就没有。那时“儿童文学”也根本不存在。

如果说有什么“精神生活”的话，那就是巡游的说书人偶尔在村里讲的一些传奇故事。由于这些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一些爱情情节，不仅私塾老师，就是家长也不准孩子们去听。当然漏洞还是有的。我们有时从说书人或乡下“戏子”那里弄到一些唱本，大家偷偷传阅——传阅得非常认真，有时超过了规定的传阅期限，就要打起架来，直到一本书被撕碎或耗损得不能再看为止。但这些究竟是供成年人消遣的东西，与儿童的生活和感情还是距离很大。我到了十四、五岁、稍微懂得一些

人生事情的时候，回想起这段人生，总觉得很惋惜，同时也希望这种情况将来能够改变，使孩子们不致再辜负他们美好的童年——那过完了就再也回不来的美好的童年。我自己也想将来成长以后，能在这方面多少做些工作。

但这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实际生活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所出生的那个县——湖北黄安县（现改为红安县）——是一个半山区的贫瘠县；而我所在的那个村子——叶家河——则更是贫瘠，缺少土地，村人大多数都到外地去谋生。我的父亲小时就到外地去当学徒，后来成了店员，我有一个哥哥也从小被带到外地去当学徒，后来就一直在外地为生活奔波。亏了他们不时寄点钱回家支援家用，再加之我母亲勤俭，在我可以发蒙上学的时候，我家已经有了十多亩土地和瓦屋（这笔财产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土改时为止），因此我才能够上几年私塾。不过到了一九二九年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也得开始为奔生活作准备了。

我的父亲觉得我已经读了几年书，如果再补充一点新的知识，如英文算术之类，就可以当个新式学徒，成为一个新式店员，这样我的命运就可能会比他们那一代人好些。于是他便把我带到外地去上一个新式学校。不幸的是，一年半以后，他劳累过度，倒了下来，被抬回到村里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我上学的经济来源断绝。回到农村去吗？那时农村已经在急剧破产，更没有什么出路。这时我已经接触到了一点新思想，知道国家贫弱，而这贫弱的原因是由于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解脱的办法是自己强大起来，而强大的法宝是科学。因此我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命，想学起科学来，用“科学救国”。这就需要具备一些有关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我就决定最低限度得把中学念完。这是一场极为艰苦的“个人奋斗”。

总之，我以三年半的时间把初中和高中的课程全念完了，几乎每学期都要跳一班。

这时已经是一九三二年，在这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攻打上海，蒋介石的政府不抵抗，农村也在进一步破产，城市也是一样萧条，找饭吃都困难，“科学救国”就更谈不上了。我一直挨到这年九月，找不到任何生活出路，便又想读书，考上了在武汉的一个大学，鲁迅先生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我也有同感，所以我便也学起文学——外国文学——来。我有许多感触想要通过文学表达出来。我开始写杂文，用十多个不同的笔名在当时孔罗荪同志编的一个报纸副刊上发表，同时也翻译一些外国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我对他们的命运也具有同情。为了把中国那些被压迫、被欺侮、被藐视的小百姓的呼声，传递到世界其他弱小民族中间去，我还用当时在东欧许多弱小国家流行的世界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名《被遗忘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这个集子于一九三七年出版，是我的第一部创作。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从大学毕业。当时毕业即失业。在学校期间由于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和翻译上面，我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我毕业后自然也找不到职业。于是我便想走得更远一点，更多吸收一点知识。但最远也只能去日本，那里的生活便宜，中国的文化人——如郭沫若和聂耳等同志——在那里也不少。当时在学校最了解我的一位教授是英国的一位年轻诗人贝尔（Julian Bell）——后来成了我要好的朋友。他同情我的境遇，也支持我的想法，便资助了我旅费，我只身到了东京。那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很多，许多人想学英文，我便成为了他们的英文教员，他们也给我一点学费，每月三元五元不等，因此我也就得以在东京生活下来了。

作为一个世界语作家，我自然和一些日本的世界语文化人——如秋田雨雀——来往，同时还用笔名在东京的一个文化刊物《学艺新闻》上写文章，也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世界语活动——当然也包括爱国活动。此外，当时西班牙内战正打得吃紧，我的那位英国朋友贝尔要去参加国际纵队，几乎每周有信来和我商量这件事。不料我的这些活动全被日本秘密警察暗中所侦悉，于是在芦沟桥事变前两月，他们忽然来把我抓去关起来。芦沟桥事变以后他们才做出结论，认为我“虽然没有颠覆日本的直接行动”，但“是一个具有极端危险思想”的人，把我驱逐出境。

我回到国内后接到贝尔的母亲来信，说他已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战死，尸骨就埋在埃斯古里尔前线。我感到万分悲恸。幸好那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形势好转，我参加了当时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中去了。当时文艺统一战线工作也活跃起来，我也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国协会”的发起工作。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侵略军已经打到了武汉外围，三厅人员也在撤退，我决定前往香港，利用我所掌握的一点外文，继续做抗战的宣传工作。

在香港，总的说来，与外界的联系是方便多了。我开始将大量中国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寄往国外的一些文学刊物发表，如伦敦的《新作品》(New Writing)、纽约的《小说》月刊(Story)和莫斯科的《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 Literature)等。我还编了一个叫做《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的英文刊物，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国协会”的对外宣传刊物。同时我也用世界语译了一本抗战短篇小说集，名《新任务》(Nova Tasko)和用英文译了一部《中国战

时小说集》(Wartime Chinese Stories)在香港出版。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天，太平洋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这种工作也不便于再在香港继续做下去，于是我便经由越南来到重庆。

我在重庆找到了教书的职业，先后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或外国文学。但想要做点业余文学工作不容易。凡是反对分裂、支持一致抗战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以后。我至多不过只能翻译些外国的古典文艺作品。在重庆这段期间（共四年），从古希腊的悲剧到近代美国的反法西斯小说，我一共译了七部书。一九四四年，欧洲盟军正在准备开辟第二战场，作为盟军基地的英国也在动员全国人民准备行动。作为动员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战时宣传部聘请了一些参与抗击日、德、意法西斯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去向英国民众演讲本国人民的抗战事迹。我也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请去到英国各地作巡回讲演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为止。我每天平均演讲两次，一共作了六百多次演讲，走遍了英国各地。作为酬谢，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了我两年的助学金，到剑桥大学去研究欧洲文学。我的抗战宣传工作到此算告一结束。

剑桥大学的生活是安静的，远离了连年动乱的中国。但这也不是世外桃源，中国的事情仍然不时萦环在我的脑际。许多外国朋友们，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常常和我谈起中国、中国的文化和人民。他们对此并不是毫无知识，但他们的知识都受到了极大的歪曲，追究其原因，除了外国的传教师及所谓“中国通”散布了一些有关中国人民的错误印象外，中国在海外的一些买办文人，如林语堂之流，通过他们用外文写的一些著作，也起了有意歪曲的作用。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些有关中国的文

章，帮助外国人民比较正确地理解中国。我开始为英国以及欧洲的文艺刊物写文艺作品，同时还出版了三部书——即短篇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长篇《山村》（Mountain Village）和《它们飞向南方》（They Fly South）——和一本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选《三季》（Three Seasons）。我用英文写的三部创作在世界许多国家有不同的译本，现仍然在流行。其中《山村》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时，被英国“书会”（Book Society）——出版家和作家的一个共同联合组织——评选为该月英国出版的“最佳作品”。

剑桥大学的生活虽然安静，但对我说来却也加强了一种寂寞感——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中国的连年战乱，中国人民的艰苦生活和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常常回到我的记忆中，特别是那枯燥单调的童年。我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和生活斗争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但是为少年儿童却什么都未作，也无时间和机会作。这种心情逐渐成了我的一种思想负担。我开始想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尽点力。我的那部长篇小说《它们飞向南方》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它是尝试用童话形式写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完成后，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欧洲文学界所推崇的安徒生的全部童话作品。这些作品立刻吸引住了我。据我所具有的关于中国文学的有限知识，由于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中儿童文学的传统非常薄弱——也可以说没有，除了一些以培养封建卫道士为目的的封建教条著作外，我们没有人专为儿童写过适合他们阅读的童话作品。这就使我产生了翻译全部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意图。我想把这些作品忠实地移植过来，不仅可以给我们的儿童提供一份有益的读物，也可以把它们变成我们文学中的财富，作为我们新儿童文学创作的借鉴。因此从一九四七年秋天起，我便开始做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部作品的

准备。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每年总要利用寒暑假去丹麦两次，住在丹麦朋友家里，学习他们的语言，也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吸进丹麦这个北欧小国所特有的一种童话空气——特别是在冬天，在圣诞节前后这种空气尤其浓厚。

就这样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译起安徒生的童话来。当然这只是业余活动，因为我还得把我的主要时间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时间过得快，转眼之间一年又过去了。世界政局又在起新的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又有爆发的危险。就在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我接到法国科学家居里、画家毕加索和诗人亚拉贡寄来的一封公开信，邀请我去波兰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目的是保卫世界和平；接着波兰驻英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正式邀请我去波兰，并且立即给了我入境的签证——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我于是便去波兰参加了这个大会——世界和大就是在这次会上产生的。在会上我遇见了从我国解放区派去的记者和观察员。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我国已临近解放。我想我再住在欧洲做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回到英国后便定了船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启程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最初，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的对外文化联络局当干部。业余我用英文编了一个文学丛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向国外介绍中国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第一辑(一九五〇年)出版后引起国外进步文艺界的广泛注意，纷纷来信要求把它变成期刊。恰好当时外文出版社成立，我便被调到该社专职做编辑《中国文学》的工作，正式改为期刊。它同时也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业务领导，并且成为作协的一个对外刊物，茅盾同志为主编，我为副主编，直到一九七四年我才离开这个刊物。

在编这个刊物的二十多年间，我的业余时间很少。但我仍然争取译完了安徒生的童话全集（约一百来万字），我自己也

偶尔写了一些以中外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童话故事，如短篇集《新同学》和《小仆人》等。当然我也写了一些以成年人为对象的小说和散文，特别是在“四人帮”对我专政的后期，“监督”比较松了一点，我难得每天晚上有些空余，便利用它秘密地写了一些小说，最主要的是一部三部曲。（编《中国文学》期间，一般晚上也得把时间投进编辑工作中去。）我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作品计有中篇《开垦者的命运》和《在草原上》，散文集《两京散记》和《天安门之夜》，长篇小说《火花》、《自由》和《曙光》（即上述的三部曲）及《王子和渔夫的故事》、《叶君健童话故事选》、《潘朵娜的匣子》、《姐姐洛琶》、《叶君健近作》等。由于“四人帮”的摧残，过去几年间少儿读物奇缺，品种也极单调，为了“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我曾利用外国一些民间故事作为素材，尝试写了一些童话故事，收成为一集，名《真假皇帝》。最近我还译了法国作家法朗士写的一些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散文，目的是除了想为少儿读者提供一点新品种的读物外，还想供我们儿童文学作者写散文时的参考。

现在儿童文学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方面的书籍和刊物也逐渐出的多起来，情况在向繁荣的方向发展。我过去由于种种其他工作的需要，只有业余做点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生命剩下的时间不是太多，我希望尽量争取机会，能在这方面多作一点工作。